

城市老年人“老有所为”社会支持机制的生成逻辑

高姝涵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上海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1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28日

摘要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背景下, 推动城市低龄老年人“老有所为”成为老龄治理的重要议题。现有研究多从影响因素层面展开分析, 对社会支持机制的生成过程关注不足。基于积极老龄化理论、社会支持理论、社会交换理论与结构化理论, 本文构建“主体需求 - 制度回应 - 社会网络 - 互动调适”四维分析框架, 探讨城市低龄老年人“老有所为”社会支持机制的生成逻辑。研究发现, 该机制源于主体需求驱动, 经由制度回应实现结构化建构, 通过社会网络完成资源嵌入与实践转化, 并在持续互动调适中实现动态优化与演进, 四者共同构成一个动态生成与循环再生产的支持体系。同时, 该机制在现实运行中仍面临需求公共化不足、制度整合碎片化、日常情境嵌入不充分以及反馈机制不畅等结构性困境。研究从生成逻辑视角丰富了相关研究的解释路径, 并为城市低龄老年人社会参与支持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

老年人, 老有所为, 社会支持机制, 生成逻辑

The Generative Logic of Social Support Mechanism for Urban Elderly People's "Productive Engagement"

Shuhan Gao

School of Management Studi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Received: June 3,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16,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28, 2026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active aging, promoting "productive engagement"

文章引用: 高姝涵. 城市老年人“老有所为”社会支持机制的生成逻辑[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9): 599-606.
DOI: 10.12677/ar.2026.139699

among urban young-old adults has become a critical issue in aging governance. Existing studies mainly focus on influencing factors, paying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generative process of social support mechanisms. Drawing on active aging theory, social support theory,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d structuration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four-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ubject needs—institutional response—social network—interactive adjustment” to explore the generative logic of the social support mechanism for urban young-old adults’ productive engagement. The study finds that this mechanism originates from subject needs, undergoes structural construction through institutional response, achieves resource embedding and practical transformation via social networks, and realizes dynamic optimization and evolution through continuous interactive adjustment. These four dimensions together constitute a dynamically generated and circularly reproduced support system. Meanwhile, in practical operation, the mechanism still faces structural dilemmas such as insufficient publicization of demands, fragmented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inadequate embedding in daily contexts, and poor feedback mechanisms. This research enriches the explanatory pathways of relevant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tive logic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supporting urban elderly people’s social participation.

Keywords

Older Adults, Productive Aging, Social Support Mechanism, Generative Logic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推动老年人“老有所为”已上升为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2025 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¹明确提出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关于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 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指导意见》²进一步强化了政策框架。然而政策推动与现实参与之间存在明显张力，2000 至 2020 年间全国范围内低龄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张，群体健康水平、教育人力资本禀赋持续改善，但城镇老年人劳动参与比例整体呈下降态势[1][2]。这表明制约低龄老年人“老有所为”的关键不在于个体能力不足，而在于支持体系在需求回应、制度供给与社会嵌入等方面的结构性失配[3][4]。既有研究主要从个体选择、资源供给与社会网络三个维度展开，分别强调健康资本与参与意愿的驱动作用，正式制度的支持功能，以及非正式关系网络的影响，但倾向于将支持机制视为既定结构，对其生成与演化缺乏深入讨论[5]-[7]。基于此，本文从生成逻辑视角出发，探讨城市低龄老年人“老有所为”社会支持机制的形成与运行特征。

2. 核心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构建

2.1. 核心概念界定

本文研究对象为城市低龄老年人，即年龄处于 60 至 69 岁之间，居于城市社区且具备基本生活自理能力和一定社会活动能力的老年群体。该群体整体健康水平较高，社会参与意愿强烈，是积极老龄化背景下推动“老有所为”的重要主体[2]。本文所指的“老有所为”特指低龄老年人在身体条件允许的基础

¹https://www.gov.cn/zhengce/202510/content_7046050.htm

²<https://www.mca.gov.cn/n152/n164/c1662004999980005247/content.html>

上,通过再就业、专业技能输出、社区治理等方式持续发挥经验知识和能力,实现价值再创造与生产性贡献的过程。其核心在于激活老年人的主体性,使其成为社会价值的“生产者”,从而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贡献的统一[5]。本文将城市低龄老年人“老有所为”社会支持机制界定为由多元主体围绕低龄老年人价值再创造需求所形成的支持关系体系。其中支持主体包括正式与非正式两类。政府、社区、社会组织与市场等主体提供正式支持,主要通过需求转译和规则重塑,为老年人提供合法身份与规范化参与渠道。家庭及邻里等主体提供非正式支持,依托代际关系与熟人网络,发挥信任传递与情感动员功能,将制度资源嵌入日常情境。在具体运行中各主体职责明确,政府主导宏观政策设计与资源统筹,提供制度保障。社区作为平台枢纽,推动制度资源下沉与生活化改造。社会组织与市场提供专业化服务,拓宽参与渠道。家庭及邻里侧重提供情感支撑与微观反馈,推动机制的动态优化。该机制本质上是在多元主体持续互动中不断生成与演化的动态过程[6]。

2.2. 城市低龄老年人“老有所为”社会支持机制生成逻辑的分析框架

城市低龄老年人老有所为社会支持机制是多元主体持续互动的动态系统。本文引入积极老龄化理论、社会支持理论、社会交换理论与结构化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积极老龄化理论揭示老年人是持续参与社会的重要主体,为理解其发展性需求提供依据[8]。社会支持理论认为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共同影响老年人的社会参与[6]。社会交换理论强调社会关系建立在持续互动与互惠交换之上,个体依据参与体验调整行为选择[9]。结构化理论指出制度既是行动的条件也是行动的结果,解释了支持机制的调整与再生产[10]。基于上述理论,本文构建“主体需求-制度回应-社会网络-互动调适”四维框架:主体需求是动力来源,制度回应提供结构基础,社会网络承担资源嵌入与关系联结,互动调适通过持续反馈推动机制优化。四维相互嵌套,共同揭示支持机制的生成与演化逻辑。

3. 城市低龄老年人“老有所为”社会支持机制的生成逻辑

基于前文构建的分析框架,城市低龄老年人老有所为社会支持机制的生成与演化主要表现为主体需求驱动、制度回应建构、社会网络嵌入和互动调适优化四个相互衔接的过程。

3.1. 主体需求驱动的内生动力逻辑

主体需求驱动是城市低龄老年人老有所为社会支持机制生成的起点。伴随健康水平提升、受教育程度提高以及生命周期延长,低龄老年人的角色认知与需求结构逐渐转变,关注重点由传统生存保障转向社会参与、价值实现与社会融入等发展性需求。他们希望通过再就业、社区治理、志愿服务及代际互助延续社会角色以实现个人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或借此缓解退休后的角色失落与社会疏离,获得新的身份认同与归属。低龄老年群体的需求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与层次性,且往往交织于具体的日常生活情境之中。部分人倾向于通过再就业获取经济补充,也有人更看重在社区治理或志愿服务中发挥余热以赢得尊重。借助老年教育充实精神世界的文化渴求与通过照料孙辈维系代际情感的支撑需要同样普遍,而旨在拓展社交与缓解孤独的邻里互动则构成了最为日常的交往方式。这些需求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常常在同一老年人身上复合呈现,参与社区调解的老年人可能同时在寻求价值认同、社交拓展与老有所学的多重满足,且这种需求组合会随生命周期与生活境遇的变化而动态调整。加之群体内部在健康、教育、职业与家庭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其需求优先级也各不相同。可见老有所为是建立在多元需求基础上的复合实践,传统标准化供给模式难以有效回应这种差异化诉求。当大量老年人在参与中面临相似障碍时,原本分散的个体困扰逐渐呈现群体性特征并进入社区议事平台、媒体讨论及网络社群等公共空间。这让老有所为由个体需求转变为公共治理议题,推动政府和基层治理主体将其纳入治理议程。因此主体需求

不仅构成机制生成的内生动力，也通过持续的问题表达与公共化过程推动其进入制度建构阶段。

3.2. 制度回应推动的外部建构逻辑

当低龄老年人的发展性需求逐渐溢出私人生活领域并进入公共治理议程，社会支持机制也随之由内生需求驱动转向制度化建构。制度体系在其中承担着关键的转化功能，不仅在于回应既有需求，更在于通过需求转译、规则重塑与资源配置将原本分散化与情感化的参与诉求整合为可识别、可操作的治理对象，从而为老有所为提供稳定的结构支撑。从具体运行过程来看，这一建构首先体现为需求的转译与类型化识别，即实现从模糊诉求向治理对象的转化。由于低龄老年人的参与意愿通常具有较强的情境性与碎片化特征而难以直接进入政策体系，制度回应的关键便在于对多元需求进行识别与分类。在此过程中隐性需求逐步转化为显性政策对象，并通过赋予制度化身份标识使低龄老年人获得稳定的参与通道与角色定位。在需求被结构化识别的基础上，制度体系进一步通过规则设计与平台搭建将参与行为从自发状态引入规范化轨道。如依托社区协商议事平台等制度载体，相关支持机制得以具体化与可操作化。制度安排不仅承担资源供给与组织协调功能，也在实践中发挥行为规范与角色塑造作用可以通过明确参与边界与激励标准将个体行动纳入规范框架以降低不确定性，也借助荣誉表彰与积分兑换等方式提供社会认可强化其退休后角色的延续性。然而随着制度体系逐步成型，其内在局限也随之显现。制度所建构的往往是标准化与理性化的支持框架，而低龄老年人的日常实践则深度嵌入具体的生活情境与社会关系之中，两者之间存在天然张力。当制度化资源自上而下进入生活世界时，容易出现适配不足，如政策信息触达困难、参与安排与日常节奏冲突、正式激励难以转化为情感认同，导致部分制度安排悬置。仅依赖制度供给难以完成支持机制的闭环运行，制度回应还需进一步向日常关系网络与生活实践空间延伸，并为后续的社会网络嵌入过程提供条件基础。

3.3. 社会网络嵌入的实践转化逻辑

制度化建构的标准化供给框架与低龄老年人情境化、情感化的生活逻辑存在固有张力，制度资源若想真正落地便需跨越正式体系与非正式生活世界之间的鸿沟，而低龄老年人的参与决策更多源于熟人关系、社区认同与情感联系而非对政策文本的理性计算，因此社会网络承担着将外在制度安排内化为老年人可感知、愿接纳的日常实践的关键转化功能。这种转化首先依托于信任传递对制度不确定性的消解，面对自上而下的制度信息，老年人往往因陌生感而观望，熟人网络、邻里口碑与社区骨干则为制度提供了信任背书，当制度资源经由熟悉面孔传递或由身边人率先示范时，抽象的政策安排便被赋予人际信用，从而降低心理防线与接受门槛。在此基础上情感动员进一步触及了制度激励难以抵达的深层动力，邻里互助、同伴邀约及社区归属感能够唤起内生性的情绪认同，让参与行为超越义务履行或利益交换而成为维系情感连带与寻求群体认同的自我选择，进而激发出更持久的参与热情。更为关键的是，制度资源必须完成向日常生活的深度嵌入，支持方式不能停留在宏大规划而需主动顺应老年人的生命节律与空间轨迹，将参与渠道融入社区交往、就近购物与家庭延伸等日常场景，通过降低物理距离与心理门槛使制度资源从外在规则转化为内在生活方式。正是经由信任消解隔阂、情感唤醒动力以及生活化改造这条路径，社会网络将悬浮的制度资源锚定于老年人的日常实践并使其从正式安排转化为稳定行为，但社区互动的维持与社会信任的深化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与修复，这要求社会支持机制引入持续的互动反馈，以实现关系网络的动态调适与长期再生产。

3.4. 互动调适强化的动态演化逻辑

互动调适是社会支持机制持续运行与动态演化的核心动力。社会网络嵌入虽促成了制度资源的实践

转化,但社区互动的维持与社会信任的深化仍需在长期实践中不断巩固,关系网络的松动与情境的变迁随时可能侵蚀既有的支持成效。这就要求社会支持机制必须突破静态的供需匹配,依托持续性的互动调适实现长期再生产。结构化理论揭示了这一演化逻辑的深层机理,既有的制度规则与资源配置固然框定了老年人的参与条件,但远未构成单向的决定力量,老年人在参与实践中生成的持续反馈亦在源源不断地重塑制度安排本身,使支持机制摆脱刚性约束并保持动态活力。这一演化过程深刻内嵌于社会交换的逻辑之中,低龄老年人在社区治理、志愿服务等场域中形成的尊重获得、价值实现与融入体验构成了最直接的反馈信号。当参与收益契合乃至超出预期时,情感回报与社会认同不仅强化了个体的持续参与意愿,更通过积极反馈巩固了社会关系网络并拉动了制度资源的持续注入,促成互惠交换的良性循环。而当参与遭遇冷落或收益低于预期时,消极体验则会削弱行动动力,倒逼支持机制进行自我反思与结构调整。随着这些微观反馈经由社区协商、日常沟通与满意度评估等渠道持续汇聚,政府与社区组织会据此做出动态回应,不断优化活动安排、改善参与形式或增加资源倾斜。历经多轮参与、反馈、调适与再参与的循环往复,原本临时化和项目化的实践探索逐渐褪去不确定性,沉淀为固定的活动机制、持续的资源配置与明确的主体分工。正是依托这种持续性的互动反馈与结构调整,社会支持机制完成了从阶段性实践向长期制度化运行的跨越,在老年人、社区与制度主体的持续互动中不断重塑规则体系,实现机制的再生产与演进。

3.5. 四维逻辑的互动关联与整体特征

主体需求作为逻辑起点催生了老有所为的初始动力,并将个体诉求推向公共议程从而召唤制度出场。制度回应通过规则重塑与资源配置为弥散的需求提供了结构支撑与合法身份,使支持体系得以确立。社会网络则在此基础上发挥关键的转化功能,借由信任传递、情感动员与生活化改造将抽象的制度框架稳稳锚定于老年人的日常实践,完成从外部供给向内在行为的跨越。互动调适作为闭环枢纽将行动者的实践体验持续反哺于制度规则与关系网络,使机制在参与、反馈与调适的循环中不断突破刚性约束,实现再生产与演进。这四个维度首尾相接,推动支持机制从需求萌发走向制度化沉淀。该机制超越了既定结构下的资源输送逻辑,其实质是在多元主体持续互动中不断生成与演化的关系体系,呈现出需求驱动的内生性、制度与生活互嵌的实践性以及行动与结构双向建构的动态性特征。而当这一生成链条置于现实情境中运行时,各环节间的衔接与转化仍面临诸多阻滞,机制的潜在张力亟待通过审视其现实困境予以消解。

4. 城市低龄老年人“老有所为”社会支持机制的现实困境

4.1. 需求公共化受阻与制度转译偏差

现有支持体系较多沿用侧重生活照料与基本保障的传统养老服务思维,对低龄老年人通过再就业或社区治理实现价值创造的发展性需求关注不足,导致需求公共化在表达与转译环节双重受阻。常态化需求识别机制的缺失使大量产生于具体社区生活场景中的分散化、情境化参与诉求难以进入公共决策空间。即便部分诉求进入社区议事平台,也常因识别精度不足被简化为笼统的养老需求加以处理,致使发展性诉求被保障性需求掩盖,陷入供需失衡状态[3]。而低龄老年群体内部在健康状况、职业经历与社会资本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如部分具备专业技能且健康水平较高者更倾向于寻求再就业以获取经济补充,而社会资本相对薄弱或身体条件受限者则更看重就近参与社区志愿活动以寻求社会认同[4]。这种需求侧的明显分化使得现有制度供给的普遍化和标准化项目难以对异质性诉求进行精准的类型化转译。何继新等提出的“主体融入机会挤压化”印证了在策略性应对下老年人的真实意愿难以被准确捕捉,造成隐性需求难以转化为显性政策对象,进一步加剧了需求增长与支持供给之间的结构性错位[4][5]。

4.2. 制度整合失效与结构支撑弱化

各级政府虽出台了大量老年人社会参与政策,但制度资源仍分散于民政、人社、教育、卫健等部门。各部门职责边界不清且协同薄弱,致使制度供给呈现碎片化特征。民政缺乏发展性参与激励,人社就业政策难以覆盖超龄劳动者需求,教育资源未衔接社区治理,健康管理 with 志愿动员相互割裂。缺乏统一协调导致支持链条断裂,形成“制度悬浮”[3]。碎片化在老年就业权益保障上尤为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³第 21 条使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关系陷入模糊。老年人无法缴纳工伤保险,用人单位规避风险仅签劳务协议致使维权困难。实务中,用人单位常以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否认劳动关系,导致老年劳动者在工伤赔偿等方面面临法律救济困境,暴露出制度规则设计存在缺位[11]。基层治理主体在执行中往往采取“策略性妥协行动”[4]。为应对考核,基层偏重组织低门槛文体活动凑足参与数量,不愿推动需深度赋能的专业技能输出。这种偏差忽视了制度安排提供身份确认的深层功能,导致老有所为流于表面,弱化了外部建构效果。

4.3. 日常情境脱节与资源嵌入受阻

社会支持机制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制度资源能否跨越正式体系的边界,成功嵌入老年人具体的日常社会关系与生活场景之中。然而伴随家庭结构小型化与居住流动性增强,城市社区中的邻里互动减少,低龄老年人的社会联系弱化,使得依托熟人网络传递信任的渠道受限。社区互助项目多以标准化的行政指令下达,缺乏熟人关系网络的情感黏合,在此情境下,制度化资源往往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入社区,由于缺乏社区骨干的信任背书与邻里口碑的情感动员,难以有效消解老年人对陌生制度的观望态度。加之部分支持方式未能主动顺应老年人的生命节律与空间轨迹进行生活化改造,如大量低龄老年人因承担隔代抚养面临时间碎片化,而现有参与渠道多安排在工作日固定时段,造成明显的时空错位,致使参与渠道未能融入日常情境,导致制度资源难以真正锚定于老年人的实际生活,呈现出脱离实际需求的悬置状态。

4.4. 反馈循环不畅与机制再生产迟滞

社会支持机制的持续运行依赖于微观实践体验向制度安排的持续反哺,但当前机制运行中普遍存在反馈循环不畅的问题。老年人在参与过程中形成的意见建议与收益感知缺乏有效渠道传递至制度层面,导致支持体系对现实需求变化的动态回应能力不足。另外参与项目缺乏持续跟踪与效果评估,无法依据消极体验及时自我反思与结构调整。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就业岗位供给严重不足,且多集中于低技术、低保障领域,志愿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间接反映出参与渠道的覆盖面与持续性存在明显短板[12]。反馈渠道的不完善与评价机制的不健全,使得互动调适难以在“参与-反馈-调适-再参与”的循环中有效发挥作用,制度规则因此失去动态调适的动力而趋于刚性化,这不仅削弱了老年人的持续参与意愿,也导致支持机制难以突破刚性约束实现长期再生产与演进。

5. 城市低龄老年人“老有所为”社会支持机制的优化路径

5.1. 疏通需求公共化渠道,提升制度转译精准性

应建立常态化需求调查与动态监测机制,及时掌握低龄老年人社会参与意愿及需求变化情况,更为关键的是要为其提供制度化的表达平台,推动分散的个体诉求有效进入公共决策空间,畅通需求公共化过程。在此基础上,制度回应需超越标准化供给思维,根据老年人在健康状况、职业经历与资源禀赋等

³https://www.gov.cn/zwgg/2008-09/19/content_1099470.htm

方面的差异实施分类支持。通过精准的类型化识别与转译,将异质性的发展性诉求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对象与服务项目,构建更加精准、多元的参与支持体系,消解需求增长与支持供给之间的结构性错位。

5.2. 强化制度整合效能, 夯实外部建构结构支撑

针对制度供给碎片化导致的结构支撑弱化,应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支持体系,打破民政、人社、教育等部门的职责壁垒,加强政策衔接与资源整合。依托社区平台整合各类服务资源,将分散的老年教育、志愿服务和就业促进平台串联成覆盖需求发现、资源供给与权益保障的完整支持链条,形成制度合力。同时,基层治理需超越对参与数量的表层关注,重视通过规则设计与激励安排为老年人提供社会认可与身份确认,切实发挥制度在外部建构中的行为规范与角色塑造功能。

5.3. 深化日常情境嵌入, 促进制度资源实践转化

应消解制度资源悬置的关键在于跨越正式体系与非正式生活世界的边界。应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与家庭的桥梁作用,通过培育社区共同体、发展邻里互助网络,重塑熟人关系网络,为制度进入老年人生活提供信任背书与情感动员。支持方式需主动顺应老年人的生命节律与空间轨迹进行生活化改造,将参与平台与服务资源深度嵌入就近购物、家庭延伸与社区交往等日常情境之中。通过降低物理距离与心理门槛,让抽象的政策安排真正锚定于老年人的实际生活,实现从外部供给向内在行为的跨越。

5.4. 打通反馈调适闭环, 推动支持机制持续再生产

针对反馈循环不畅导致的机制再生产迟滞,必须建立微观实践体验向制度安排持续反哺的渠道。应完善多元参与的双向互动机制,畅通老年人意见表达渠道,及时收集并回应参与过程中的收益感知与消极体验。健全参与评价与效果评估制度,将老年人的满意度与获得感作为资源配置与规则调整的核心依据。通过持续性的反馈、反思与结构调适,使支持机制在“参与-反馈-调适-再参与”的循环中不断突破刚性约束,实现从阶段性实践向长期制度化运行的跨越与再生产。

6. 结语

本文基于“主体需求-制度回应-社会网络-互动调适”四维框架,系统阐释了城市低龄老年人“老有所为”社会支持机制的生成逻辑与演化特征。研究发现,该机制是在多元主体持续互动中生成的动态系统,主体需求构成内生动力,制度回应提供结构支撑,社会网络促进资源转化,互动调适推动机制优化。面对当前需求识别滞后、制度整合不足等现实困境,未来应着力疏通需求表达、强化制度协同、深化日常嵌入并打通反馈闭环,以实现支持体系的持续再生产与演进。

参考文献

- [1] 程杰, 李冉. 中国退休人口劳动参与率为何如此之低——兼论中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挑战与方向[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2): 143-155.
- [2] 宋月萍, 张光赢, 彭可余. 中国低龄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现状、特征及趋势[J]. 人口研究, 2024, 48(2): 75-89.
- [3] 何继新, 高文静. 低龄老年人参与城市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 理论视角、现实困厄与实践路径[J]. 学习与实践, 2025(3): 105-116.
- [4] 何继新, 高文静. 外部约束与内生动力: 低龄老年人参与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阻碍问题研究[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25, 25(5): 65-73.
- [5] 杜鹏, 王菲. “老有所为”在中国的发展: 政策变迁和框架构建[J]. 人口与发展, 2011, 17(6): 34-38.
- [6] 王欢明, 钟峥云. 社会支持视角下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60(2): 59-74.

- [7] 孙启泮. 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的城市社区老年人互助养老意愿影响因素研究[J]. 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3): 42-50, 62.
- [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9] 彼得.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 李国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 [10]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大纲[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 [11] 鲁晓明.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之就业老年人权益保障[J]. 法学论坛, 2021, 36(4): 120-128.
- [12] 谢立黎, 汪斌. 积极老龄化视野下中国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及影响因素[J]. 人口研究, 2019, 43(3): 17-30.